

南洋人文丛书

炽热年代 铿锵声音

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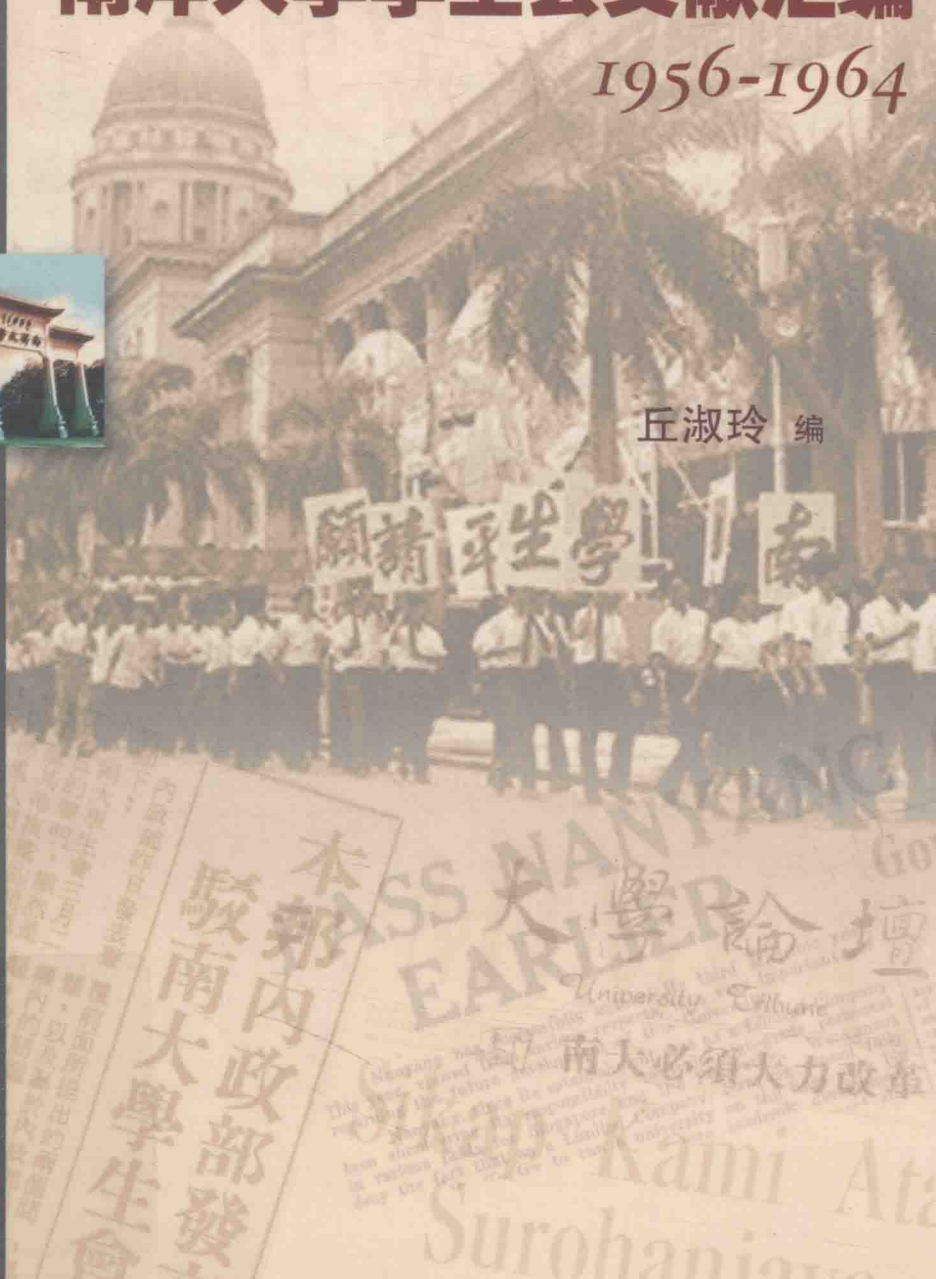
1956-1964

丘淑玲 编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

4





炽热年代 铿锵声音
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
1956-1964

丘淑玲 编

炽热年代 铿锵声晋
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
1956-1964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编 者 | 丘淑玲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陈婉君 冯婉明 |
| 丛书标志篆刻 | 何梅田 |
| 封面设计 | 何美娇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12 Nanyang Drive, Singapore 637721
www.cclc.hss.ntu.edu.sg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发 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 联 络 | 65-64665775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12年10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425-15-5 (pbk) |
| 定 价 | S\$26 |
| 版权所有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洋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袁行霈	中国北京大学

主编	李元瑾	
副主编	柯思仁	郭淑云

南洋人文丛书·南洋大学历史研究

主编	李元瑾
----	-----

“南洋人文丛书”总序

“南洋人文丛书”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第二套丛书，第一套即继续出版中的“南大语言文化丛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于2003年年终归入大学新成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与该院旗舰系——中文系分工，在研究与教学两方面相辅相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是在大学热烈回顾半世纪校史和积极朝向综合性学府目标迈进的时刻诞生。这有两层意义：第一，大学溯源固本，发扬“南大精神”，塑造学府独特气质与风格；第二，大学在理工学科基础上，加强“人文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教学课程，开拓多元化的研究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旗下各系和研究中心，紧随大学的理想与目标前行。

经历半世纪，大学的发展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学院，再到南洋理工大学，校名一直保留“南洋”二字。“南洋”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南洋大学创办时，创办人陈六使虽多次表达发扬中华文化的决心，但时时不忘大学的本土特色，于是定名“南洋”，并将发展本土文化纳入办校方针内。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基本上继承这一宗旨，重视中华文化在中国内外的发展，更关注它在本土/本地区的调适与演变，以及如何与世界文化碰撞与接轨。本丛书“南洋”二字，取自校名，既具历史意涵，也突出内容特色。

近年来，大学确立综合性学府的发展方针，加强非理工色彩，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更被誉为“大学的灵魂”（大学徐冠林校长之语）。学院除了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也为全校学生开课，“使他们能了解人文课题并欣赏文化，不会成为狭窄的、只会解决技术问题的大学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大创校五十年庆典上

的演辞)。在这功利主义挂帅、语言苍白、文学贫瘠、历史浅薄、哲学架空、文化断层的年代，大学之于人文教育与人文研究，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丛书“人文”二字，取自院名，既反映学术使命，也传达出版旨趣。

“南洋人文丛书”从2006年起陆续出版，分成系列和单本两种形式，每本书都经过内外部评审，以确保作品质量。我们要感谢各书主编和撰写者的辛劳，也希望更多专家学者加入丛书队伍，共同为学术耕耘和人文建设而努力。

李元瑾

2005年12月

在故纸堆中焕发的南洋大学学生会 (代序)

李元瑾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出版的“南洋人文丛书”之“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分别以专著、论文集和口述历史的类别面世，本书——《炽热年代、铿锵声音：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1956–1964）》（以下简称《汇编》）则为文献史料的选编，是另一类别。这一类别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史料的收集和编析是保存南大历史的重要步骤，也是呈现南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南洋大学从陈六使1953年4月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直到1980年8月举行最后一届（第21届）毕业典礼，走过27个年头。这段充满戏剧性的岁月，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有待后人去挖掘、整理、编析和出版。令人欣慰的是，南洋大学的史料汇编不是一片空白，这半个世纪以来已有一些积累。这些成果大致可分几种：一种是南洋大学存在期间阶段性的史料汇编，如《南洋大学创校史》、¹《南洋大学概况》（*Some Aspects of Nanyang University*）、²《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³ 以及各年度的大学概况和简介

¹ 《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

² Nanyang University, *Some Aspects of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 Exposition, 1959).

³ 《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新加坡：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

等；一种是1980年后出版的概括南洋大学整段历史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以集合简史、年表、文献和统计资料而成的《南洋大学史料汇编》、⁴《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⁵以及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呵 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⁶另外，还有一种是以图片方式呈现的图片集，《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⁷即是。

史料的收集与编析可以有两种重要类别，一类是纵向的、比较宏观的，一类是横切的、偏向微观的，两种做法各有其价值和意义，彼此相辅相成。上述几本南大史料汇编都是属于第一类别，也就是从纵向的、宏观的角度勾勒南大发展的概况。这种编法的优点是得以展现南大历史的脉络与走向，让读者能够一览历史的概貌，缺点则是无法为重要的南大课题作全面和深入的史料收集与编析。从学术角度和史料深度来看，第二种类别，即横切面、微观式的史料编析非常重要，它可以补充第一种类别难以旁及和深入的资料，使一些课题或专题的面貌更加清晰。南大历史的学术工作也需要往这个方向拓展。就因为如此，中心的一些学者在从事专题研究时，便有意地收集相关史料，同时计划在专题研究告一段落后继续搜寻史料，最后将史料梳理、筛选、分类与分析。本《汇编》就是在这样的构思和策划下产生。它是建立在“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第一本专著《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⁸的

⁴ 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

⁵ 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

⁶ 王如明编撰《呵 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

⁷ 纪宝坤、崔贵强编著《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新加坡：华裔馆，2000）。

⁸ 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

基础上，也是第一部采取微观与横向的角度完成的南大史料汇编。而《汇编》的主编丘淑玲便是有关专著的作者。

特殊的时代与环境缔造了一部传奇式的、悲剧性的南洋大学历史。无论是南洋大学的诞生或发展，还是创办人或校长、学生组织或学潮，亦或是评议大学的报告书、大学改制与关闭、校园建筑、校友会……都值得进行微观的探讨，其中南洋大学学生会（以下简称“学生会”）自是南大史的重要章节。学生会是南大生的最高组织，具有服务学生、辅助学校、沟通各界的功能，也是实践“自治”理念的重要场所。它统领南大生参与各个阶段的大学建设，对各种南大问题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后来甚至投入学潮和社会洪流之中。学生会的史料，足以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学的处境、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等，因此十分之珍贵。

有关《汇编》的断限、选材和编排，编者在她的“绪言”里已作了交待，这里不再赘述。《汇编》以事为点、以时为线，为史料进行选编。纵横交错之下，读者得以窥探1956年至1964年南洋大学学生会的画面，以及许多相关的图景。本书首先反映的是学生会与学生的状貌。翻阅学生会的文献，读者能够看到学生对南大生身份的自豪和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同时也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跳跃。学生会成立初期，“建设南大”是经常出现的口号，也是该会重要的会务方针。学生们热爱南大，希望通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为大学作出贡献。在物质建设方面，学生会协助大学筹募建校基金、协调大学落成典礼工作，并对各种校内硬体设施的改善提出建议；在精神建设方面，学生会鼓励同学自我充实、为南大争光。在“爱校”的理念下，学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例如筹建学生楼、举办大学周、美化校园等。其中，学生楼是由历届执委会以“接力”的方式，四处筹款，花了五年多才建成的学生活动中心，前后共耗费约60万元。直至今日，该楼仍屹立于南洋理工大学第二餐厅斜对面的山坡上。大学周是一项两年一度的综合学术、

艺术、文娱等的全校性大型活动，通过各学会的合作，以展览、出版、竞赛、演出等方式呈现，增加社会人士对南大的了解。而美化校园则是让南大荒芜角落披上新装的一项全校总动员活动，美化的范围包括南大湖和学生岗。今天南大湖的绮丽景观，便是当年学生挥洒汗水后的成果。这些精彩的片断，都在学生会史料中闪现。

南大创办后便得迎接严峻的挑战，对内面对经费、制度、行政等问题，对外又遭遇政府不承认学位、不资助经费的困难。基于爱校心理，学生会对南大问题几乎是全面追踪、清楚表态。前后不到八年，它针对南大课题所发表的声明、备忘录、建议书、信件等多达数十篇，给后人留下大量史料。学生会视协助南大发展为己任，其对解决南大问题所表现出的积极和高效率叫人刮目相看。

《白里斯葛报告书》公布后不到一个月，⁹ 学生会执委会即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声明，针对这份数十页的报告书作了全面的评析。这份声明虽然多处驳斥报告书，却也保持“无则加勉，有则改之”的客观态度。它指出报告书的缺点，例如没考虑南大的创立背景、评估时间太仓促、不应以高标准来衡量一所新大学等；但也建议大学正视报告书所提出的一些制度和设施方面的问题，如改革行政制度、聘请校长等。及至《魏雅聆报告书》公布，政府宣布对南大的政策，提出以谈判方式解决南大问题，学生会便意识到南大问题已经进入另一阶段。对于政府坚持在南大按照《魏雅聆报告书》改组后才给予资助的做法，学生会加以反对，认为这将损害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和自主权。当政府与南大当局的谈判僵持不下时，学生会力挺南大理事会，成为南大代表的有力后盾；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政府眼中“南大问题”的一部分。

⁹ 《白里斯葛报告书》于1959年7月22日公布，学生会的声明发表于1959年8月18日出版的第十期《大学论坛》。

除了南大问题，学生会也关心校外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发展。19世纪以来，华文教育的存亡绝续一直牵动着新马华人的心。二战以后，华文教育危机四伏，政府通过几项不利华校发展的法令，采取各种重视英文教育的措施，激发了华社维护华文教育的决心，而作为华校生最高组织的学生会，更觉责无旁贷。学生会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华教问题，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四改制，更是不遗余力地追踪。他们反对中四改制，多次召开座谈会，还卷入1961年新加坡中学生为抗议中四改制而发动的罢考事件。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新马尚未分家，两地华校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华校情结，在新加坡已随着华文教育发展的消退而逐渐淡化，或只残留在老一辈华校生的记忆里。但是，对马来西亚的华社而言，这种感觉和经历并不陌生，因为捍卫华文教育的情节迄今仍在当地上演。正因如此，学生会这方面的文献，依然存在某些现实意义。对拥有华文教育背景的人士来说，今日重读这些史料，仍然感触甚深，为字里行间的忧患意识所牵引。

南大问题与华文教育问题，使学生会与政府的关系恶化，一种抗争模式逐步形成，并且从言论上的抗争走向行动上的抗争。1963年之前，南大学生会主要在言论上进行抗争，为华教遭受不平等待遇、为学生会出版受到严厉管制，提出抗议。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新加坡的政治局势随着政府决定加入马来西亚而变得紧张，朝野两大政党——人民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当学生会选择在9月的大选中为社阵助选时，其抗争已进入行动阶段。1963年大选结束，新加坡政治部即刻在南大校园展开两次逮捕行动，引发学生会行动抗争的全面爆发，最终导致学生会的落幕。掀开尘封的故纸堆，人们可以听到那个年代，南大生愤怒的抗议声和急促的脚步声。

学生会的抗争，不仅从言论转为行动、从校园内走向校园外，而且也从教育争执发展到政治角力，读者可以从《汇编》窥探这种

变化。南大与政治，一直是南大史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这所大学，因其民办的某些特质和华族色彩，从创办开始就不曾摆脱过跟政治的纠缠，其改革、学潮甚至至于关闭，无不与政治挂钩。当时，新加坡政府为了施行以英文教育为主的教育制度，要求南大根据官方蓝图改制。因为涉及大学本质和控制权的敏感问题，南大当局无法妥协，致使改革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其间，学生会以学生代表的身份，紧密跟踪、积极发言，对政府造成不小的压力。与政府周旋的结果是，学生会的言行无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当政府对学生的活动、言论和出版进行监视和压制时，学生会作出理直气壮的抗议与反驳。虽然南大领导人一再强调南大不可涉及政治，但到了60年代中期，南大已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1963年，十名南大毕业生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选，南大生毫不掩饰地支持标榜左派的社阵，把这场政治角力推向高潮。随后的大逮捕，是执政当局对南大的“政治肃清”。南大在整个60年代几乎被政治气氛所笼罩。

《汇编》有关南大学潮的文献，即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动荡以及学生的激情。

学生会之所以有着浓厚的政治意识，也跟整个大时代的思潮发展有关。50、60年代是左倾思潮引领风骚的年代，青年学子在左倾思想、反殖思潮的影响下，对现实和理想有很高的要求和追求。他们不仅致力于维护自身文化、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还与国际接轨，与各国学生互通声息。学生会支持国际上的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殖斗争等，谴责国际上不平等和受压迫的现象，如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韩屠杀学生事件、刚果总理被杀事件等。为了跟上时代的节奏，学生会领袖还跨出小岛走向世界，与各国学生进行当时盛行的“学生外交”活动。他们到过的国家包括印度、秘鲁、伊拉克、摩洛哥、以色列、印尼、菲律宾、加拿大、瑞士等。这些外交活动多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内容涵盖学生福利、学生的任务与角色、国际学生的合作与团结问题、国际政治局势等等。

国际间学生的交流和碰撞，让学生会领导人开拓眼界、建立自信。他们视关心政治、谈论政治为一种责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学生们俨然一副政治家的模样，发表“忧国忧民”的言论。《汇编》收集了学生会代表出国开会后的报告和心得，让读者通过这些“学生外交使者”的眼睛窥探当时的局势，以及大学生的理想、热情和抱负。

那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各方利益互相撞击与博弈的年代，学生会与大学之间，学生会与政府之间，学生会与社会之间，大学生之间，有时候可以协调，有时候发生争执，甚至冲突。学生会的言行，不是每次都获得各方的部分赞同或完全的赞同。《汇编》的最后一章，让不同的声音响起。这些认同、质疑或反对的声音，来自校园的学生和团体，来自社会、来自政府、来自媒体等，突显了学生会及其成员具有争议性的一面。《汇编》的安排，避免了史料来源的单一性，也使学生会的图像立体化。

《汇编》所反映的学生会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当年学生会满腔热情地进行全校性的筹款与劳动，忧心忡忡地参与南大改革，理直气壮地投入学潮、卷入政治，意气风发地进行国际性的“学生外交”……如今这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随着时代的演变、环境的改变，现代学生的际遇大异于前，他们不必面对政治社会转型期间的矛盾，不必肩负建国和维护自身文化的担子，也就缺少了那个年代的学生所特有的理想与激情。我们不能过度地缅怀过去，也无法停留在某一时段，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么多热血沸腾的身影，作一些回顾和记录，是很有意义的。本书编者丘淑玲在出版了《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之后，再完成这本史料汇编，让两本书围绕着共同的课题，相互印证和补充，也为有兴趣研究南大历史的学者，以及关心南大和南大历史的校友和读者，尽了她个人的心力。

绪言

南洋大学（以下简称“南大”）走过27年的道路，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待后人去挖掘和整理。有关南洋大学史料的编辑，迄今已出版的包括：《南洋大学创校史》、¹《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²《南洋大学史料汇编》、³《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⁴以及《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⁵等。这些史料汇编，基本上是从纵向及较宏观的角度勾勒南大的面貌。

笔者在2006年出版《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⁶专著，深感以学生会为主体的史料非常珍贵，于是配合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的出版计划，在原有的文献史料上，继续搜索，然后加以筛选和编辑，最后完成这本《炽热年代、铿锵声音：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1956-1964）》（以下简称《汇编》）。

早期南大的历史非常丰富，其中学生和学生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50、60年代，学生是华校发展与社会运动中一股不可

¹ 《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

² 《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新加坡：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6）。

³ 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

⁴ 纪宝坤、崔贵强编著《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新加坡：华裔馆，2000）。

⁵ 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

⁶ 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

忽视的力量。作为华校学生队伍的最高成员，南大学生肩负了社会的使命，也继承了华校生的特质，例如热情、充满理想、敢怒敢言等。他们的言行，足以反映南大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状貌。而南大学生会则是南大学生群体的最高组织，它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南大生的思想意识。因此，研究学生会也就成为研究南大学生以及南大史的重要切入点。

实际上，南大学生会的历史前后总共16年，可划分为改制前（1956-1964）与改制后（1972-1980）两个阶段，而1965年是转折年。1965年改制前，南大学生活动蓬勃缤纷，校园里各种学会林立，团体活动频繁，反映出南大生的热情和活力，以及他们对大学、社会、国家和时局的关怀。作为南大生的最高团体，学生会对南大学生活动、南大发展动向、民族教育、国家建设等事项或课题扮演了领导或积极参与的角色。就在酝酿改制期间（1964年），南大学生会被指参与政治活动而遭冻结七年。七年的停顿彻底地让学生会改头换面。1965改制之后，南大的学制、教学、行政各方面都面临重大的改革，学生团体的学生纪律也面对严格的管制，学生会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与行为表现上，也跟过去有明显的差距。改制后，南大基本上在各方面取得相当平稳的发展，许多改变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在校方严格的管制下，学生即使有些不满，也难有作为；加上60年代中期的一连串逮捕、开除事件对南大生造成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的热情渐渐冷却，南大校园遂呈现与早期的热闹沸腾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断限方面，鉴于学生会的纵向发展有如此明显的分水岭，《汇编》决定把上述两段历史切割开来，仅专注在第一阶段，进行史料选编。这一阶段的学生会处于世界局势变化和本地区政治动荡的时期，复杂的时空交错促使它关注的课题较广，涉入的程度也较深。它对当时的南大改制、民族教育、新马合并、国际局势等问题，都有鲜明的原则和立场。我们可以从学生会的文献当中看到许

多理性的声明或建议书、热情洋溢的宣言，以及慷慨激昂的文告和函件等。最重要的是，学生会的这些活动、心声和思想都有相当完整的文字记录，因为它重视用文字和出版活动传达心声和讯息。这个特色，让本史料的汇编变得可能。

在选材方面，《汇编》一共收录了144篇学生会声明、函件、宣言、建议书、备忘录、报告、出版物的社论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来自历届学生会执委会常年报告书、《大学论坛》、《学生会会讯》、学生会出版物、各中文报章及传单。《大学论坛》是学生会的喉舌报，曾以华、英、巫三种语言出版，里头刊载了代表学生会立场的言论，也有其他南大学生的文章，是南大早期具代表性的学生刊物之一。而《学生会会讯》则是《大学论坛》停刊后，学生会用以报道其活动及表达心声的一份刊物。《汇编》选材的准则是尽量选择以学生会名义发表的言论，学生会与其他团体联合发表的声明、个别学生会执委的报告或谈话，则酌情选录。由于《大学论坛》除了传达学生会的言论讯息，也刊载其他南大生的文章，因此，《汇编》只收录每期的社论和一些较具代表性的报告。历届学生会执委会常年工作报告中的声明则大部分被收录。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汇编》只限于文献史料，不包括口述史料。

在内容编排方面，本书按文献内容性质分为六个部分，构成六章。第一章以创建与活动为焦点，第二章侧重南大课题，第三章关系到内外风波与学潮，第四章是有关新马教育、政治及文化课题的言论，第五章是转移到对大局势的关注，第六章收录了11篇其他组织或个体论及学生会的言论，如政府的文告、南大其他学会或团体的声明、报章社论等等。这些文献有的与学生会的立场相反，有的则中立，体现出不同观点。

历史文献的收集是一个庞杂的工程，它会给我们惊喜，却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耐心和毅力。更重要的是，必须碰到同样珍爱这一段历史，有心保护这一段历史的同道者。在《汇编》搜集史料的过

程中，我们受惠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山陶德书香楼、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典藏的南洋大学史料；同时，我们也遇上了一些热心人士和南大校友，他们的臂助让我们把许多缺漏的地方补足，增加了我们出版本史料集的信心。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庄伟天先生，他无私地借出许多个人收藏的南大和学生会的资料，让我们看见这一段历史的轮廓，最终才有把握尝试把它重构。如果说编辑或研究这段历史有着一些贡献，那么慷慨惠借和捐助这些史料的机构和人士更是功不可没。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中心资助出版此书，以及中心主任李元瑾老师这些年来给予的机会、鼓励和指导。这本《汇编》的编辑，是在李主任的支持与推动下才得以成书。李主任乃笔者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她对学术的热爱、细心和专业的精神，深深启发了笔者。在她的身上，笔者看到了南大人的坚持与理想。本书的出版，老师特别在百忙中拨冗写序，让笔者感动不已。谨此再次感谢老师无私的教导与付出，也祝愿老师一切安好。